

孙中山评传(下)

茅家琦等著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匡亚明 主编

南京大学出版社

孙中山评传(下)

第三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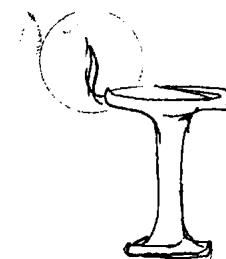
孙中山与孙逸仙



匡亚明 主编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孙中山评传(下)

茅家琦等 著



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孙中山评传/茅家琦著.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4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匡亚明主编)

ISBN 978 - 7 - 305 - 06017 - 5

I. 孙… II. 茅… III. 孙中山(1866 ~ 1925) - 评传
IV. K827 =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86189 号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典藏版)

孙中山评传

茅家琦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

(南京大学校内 邮政编码:210093)

安徽省儒林图书有限公司 发行

网址:www.rulin.com.cn

三河市华新科达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开本 660 × 960 1/16 印张 64.5 字数 724 千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305 - 06017 - 5

定价:128.00 元(上、中、下)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名誉顾问 陆定一 谷 牧 李铁映 陈焕友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 王霞林

组 员 王 湛 陈万年 石启忠 韩星臣

洪银兴 冯致光

学术顾问 (按姓氏笔画为序)

丁光训 丁莹如 王元化 王朝闻

冯友兰 曲钦岳 任继愈 刘导生

刘海粟 安子介 孙家正

杜维明(美国) 杨向奎 苏步青

李 侃 吴 泽 何东昌 张岱年

陈 沂 罗竹风 赵朴初 施觉怀

钱临照 徐福基 袁相碗

席 文(美国) 唐敖庆 黄辛白

蒋迪安 程千帆 谭其骧 滕 藤

戴安邦 魏荣爵

主 编 匡亚明

终审小组 茅家琦 周勋初 林德宏

副 主 编 (按姓氏笔画为序)

卞孝萱 巩本栋 时惠荣 张永桃

陈 振 茅家琦 林德宏 周勋初

洪修平 蒋广学(常务) 潘富恩

孙中山评传

第十二章 “联俄”思想的形成和它的主要内涵

(作者:茅家琦教授)

第一节 早期与俄国人的接触

一、“二月革命”前后和俄国人的交往

孙中山与俄国人的接触,始于1896年伦敦蒙难以后。1897年初,孙中山在伦敦写成了《伦敦被难记》。在彼得堡刊行的俄文杂志《俄国财富》的主笔在伦敦拜访了孙中山。孙中山向这位主笔表示,希望他将《伦敦被难记》译成俄文在《俄国财富》上发表。不久,这份杂志译载了该书并发表该刊主笔与孙中山的谈话内容。1897年《俄国财富》第5期又译载了孙中山在伦敦《双周论坛》上发表的《中国的现在和未来——革

新党呼吁英国保持善意的中立》一文。^① 这时孙中山的名字就在俄国先进分子中间传播开来。

孙中山对俄国的政治动态也十分关注。1905年俄国爆发了大规模的革命运动。在东京出版的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不断地刊载有关俄国革命的文章，表达了高度的关切与同情。同年10月，孙中山在日本长崎结交了俄国民粹主义者的机关刊物《民意报》的主编鲁赛尔。^② 两人谈话十分投机，以后长期保持通信关系。鲁赛尔赞赏孙中山的抱负和奋斗精神，还替孙中山向西方人士呼吁，要他们帮助“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国家的复兴”。这位俄国革命者写了《中国之谜》一文，表达了对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的同情，和对中国革命成功的希望。孙中山也为自己结识了这样一个朋友而欣慰。1906年11月8日，在《致鲁赛尔函》中，孙中山说：

我很满意地拜读了您的有趣的文章《中国之谜》，它给我很深刻的印象。您的思想卓越，您的胸襟宽阔。在西方代表人物中，我很少见到有像您这样能为中国复兴和实际保证中国千百万受苦受难居民生存条件的思想主持正义的人。^③

1906年孙中山在日本还结识了另一位俄国人——该鲁

^① 见李玉贞：《孙中山与共产国际》，第6~7页，台北，1996年。《中国的现在和未来——革新党呼吁英国保持善意的中立》一文见《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87~106页。

^② 亦译作拉锡尔。

^③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18页。



学尼。他是俄国社会革命党的领袖之一。他从西伯利亚越狱成功，在赴美途中路过东京，偕波德巴赫，登门拜访孙中山，谈了“五权分立”问题。^①

孙中山对俄国革命党人有好感，对俄国革命党人的革命精神一直很赞赏，1910年在旧金山丽蝉戏院演讲时，孙中山说：

今日有志革命而尚未成功者，只有俄罗斯耳。然此亦不过一迟早问题，其卒必能抵于成，则不待智者始知也。……俄人革命虽有种种之难，然俄国志士决百折不回之志，欲以百年之时期而摧毁俄国之专制政体，而达政治、社会两革命之目的。^②

1917年俄国爆发“二月革命”，推翻沙皇专制政府，社会革命党领袖克伦斯基组织了临时政府，孙中山致函俄京圣彼得堡表示祝贺，并认定“俄国革命必定成功，欧战中的同盟协约国都一定失败”。^③

二、“十月革命”后与俄共(布)的接触

十月革命爆发，推翻了克伦斯基的临时政府，对事变的真相及其含义，孙中山一时并没有弄清楚。但是苏俄政府的对

^①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19～320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443页。

^③ 转引自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第1021页。



华政策宣言却引起孙中山的热烈欢迎。

苏维埃政府颁布了《和平法令》，声称“废除秘密外交”，“立刻着手公布地主资本家政府从1917年2月到10月25日所批准和缔结的全部秘密集约”。1917年12月23日苏俄《消息报》刊载了1916年7月3日，日本和俄国签订的侵害中国东北地区主权的秘密条约。1917年底，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向中国提出组织混合委员会解决中东铁路问题的建议。^①看到这些宣告，孙中山当然非常高兴。1918年1月28日，出席广州警界宴会时，孙中山说：“此后我国形势，应注意于西北，若俄国现在之革命政府能稳固，则我可于彼方期大发展也。”^②1919年7月25日，苏俄政府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宣布帝俄政府在中国东北及别处用侵略手段取得的土地，一律放弃；废除帝俄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和租界；放弃帝俄在中东铁路的特权；放弃庚子赔款的俄国部分；建议正式恢复两国人民的友谊。1920年9月27日苏俄政府发表第二次对华宣言，重申帝俄与中国缔结之原有条约概为无效，俄国在中国的租借地概行退还，帝俄政府及俄国资产阶级在中国所侵夺之权利，一并永远无偿退还中国，并建议中俄正式建交。这次宣言由北京政府派往苏俄考察的张斯麟于11月28日带回国。这两次宣言明显是一种策略性行动，目的是争取中国北京政府的承认，以对付日本，并有利于在西伯利亚地区镇压白卫军。第二次对华宣言发表后不到两年，1922年8月31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开会，出席人员有加米涅夫、托洛茨基、李可

^① 转引自李玉贞：《孙中山与共产国际》，第32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320页。



夫、托姆斯基、季诺维也夫、加里宁(候补委员)、斯大林。会后致电越飞说：“中央认为，在同中国谈判时，从1919到1920年的总宣言中得出直接指示是不能允许的，当时中国对这个宣言并未作出相应的反应”。^①但孙中山对这两个宣言仍然十分欢迎。

1920年10月31日，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写信给孙中山，要求与中国争取解放的力量建立联系。这封信直到1921年6月14日才到达孙中山手中。8月28日，孙中山写了回信，回信说：

首先，我应当告诉您：这是我从您或苏俄某一位那里所收到的第一封信而且是唯一的一封信。最近两年来，在资本主义的报纸上曾经有几次报道，断言好象莫斯科向我作过一些正式的建议。其实任何这样的建议都没有用信件或其他方式通知过我。万一从您的同僚中有谁已往曾寄信给我或现在正寄信给我，那么让我告诉您，我还没有收到过一封信。

.....

在您写信给我以后，我当选为广州国民政府底总统。这个政府是合法的政府，因为（一）它本身的权限是根据一九一二年在南京召开的第一次立宪会议所通过的《临时约法》和一部唯一的《中华民国组织法》；（二）它的成立是为了执行在法定的中国国

^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114～115页。



会中按照约法所赋予全权的政权机关底决议，现在国会会议正在广州举行。我的政府也是实际的政府，它的权限已经为中国西南诸省及其权力所及的其他各省所承认。

现在，因为地理条件，我还不可能和你们发生有效的商业关系。只要看一看中国地图，您就可以看出：我的政府管辖下的领土是在扬子江以南，而在这片领土与满洲和蒙古的“门户”之间——只有经过这些“门户”才可能建立商业关系——，有张作霖及其同盟者横梗着。……当我还没有肃清那些在首创的革命后第二天便在全国各地出现的反动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时，莫斯科就应当等待一下。您最近三四年来的亲身经验，会使您能够了解我所面临的是何等艰难的事业。我最近九、十年以来都在从事于这一艰难的事业。如果不发生某种形式下的积极的外国干涉，我希望能在短期内完成这一事业。外国干涉是很少可能的，因为这涉及到西方列强。它们大概已被北京喂饱了。

在这个期间，我希望与您及莫斯科的其他友人获得私人的接触。我非常注意你们的事业，特别是你们苏维埃底组织、你们军队和教育底组织。^①

这封信是从俄文《布尔什维克》杂志回译过来的，它经过一次翻译和一次回译，在文字上肯定与原信不一致。但总的

^① 《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591～593页。

思想内容不会有原则差别。从这封信中,完全可以看出,孙中山希望和苏俄保持友好接触,进一步了解苏俄,但并没有建立密切联系、中俄“两党团结共同奋斗”的想法,更没有求助于苏俄的意图。

有一种传统说法,1918年夏孙中山曾致电列宁和苏维埃政府说:“中国革命党对贵国革命党所进行的艰苦斗争,表示十分钦佩,并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① 1918年8月1日,列宁委托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复函孙中山,向孙中山致敬,并说:“在这个艰辛的时刻,俄国劳动阶级就向他们的中国兄弟呼吁,号召他们共同进行斗争。”^②前已说明,孙中山自称:1921年6月14日以前,他没有从苏俄那里收到一封信。1921年11月6日契切林将孙中山1921年8月28日给他的复信送给列宁,他对列宁说:“送上孙逸仙的信,其中有对您的问候。他称您是他的朋友,您本人同他认识吗?”11月7日列宁给契切林的便函说:“我不认识他,我们互相也从未通过信”。^③ 因此,这两封信的真实性都应存疑。

^① 见《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500页。该全集注明:转引自叶尔马舍夫著《孙逸仙》一书,又注明:“此电未见全文。”

^② 复函引自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第1129页。原注:转引自孙剑晨译《与孙中山交换的外交信件》,载《史学译丛》,1958年第3期。《孙中山年谱长编》编者又云:“但先生并未收到此函”。

^③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运动(1920—1925)》,第66、67页。



第二节 共产国际的视线转向孙中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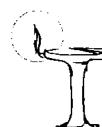
一、列宁提出《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

共产国际成立以后，在欧洲发动的革命一一失败。1920年6月列宁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草拟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提纲初稿”有下列几段话：

共产国际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的全部政策，主要应该是使各民族和各国的无产者和劳动群众为共同进行革命斗争、打倒地主和资产阶级而彼此接近起来。因为只有这种接近，才能保证战胜资本主义，如果没有这一胜利，便不能消灭民族压迫和平等的现象。

目前的世界政治形势把无产阶级专政提上了日程，世界政治中的一切事变都必然围绕着一个中心点，这个中心点就是世界资产阶级反对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斗争。而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必然要一方面团结各国先进工人的苏维埃运动，另一方面团结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的一切民族解放运动。这些民族根据自己的痛苦经验，深信除了苏维埃政权战胜世界帝国主义之外，他们别无生路。

因此，目前不能局限于空口承认或空口提倡各民族劳动者互相接近，必须实行使一切民族解放运动和一切殖民地解放运动同苏维埃俄国实现最密切



的联盟的政策，并且根据各国无产阶级中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程度，或根据落后国家或落后民族中工人和农民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运动发展的程度，来确定这个联盟的形式。

.....

在封建关系或宗法关系和宗法农民关系占优势的比较落后的国家和民族中，要特别注意以下各点：

第一，各国共产党必须帮助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运动，首先是落后民族在殖民地关系或财政关系上所依赖的那个国家的工人，有义务进行最积极的帮助；

.....

第四，必须特别援助落后国家中反对地主、反对大土地占有制、反对各种封建主义现象或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运动，竭力使农民运动具有最大的革命性，并且使西欧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与东方各殖民地和一般落后国家的农民革命运动之间实现尽可能紧密的联盟；必须特别尽一切努力，用建立“劳动者苏维埃”等方法把苏维埃制度的基本原则应用到资本主义前的关系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中去；

第五，必须坚决反对把落后国家内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思潮涂上共产主义的色彩；共产国际只是在一切落后国家中未来的无产阶级政党（不仅名义上是共产党）的分子集合起来，并且通过教育认识到同本国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作斗争这些特别任务的条件下，才应当援助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



主民族运动；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但是不要同他们融合，甚至当无产阶级运动还处在萌芽状态时，也绝对要保持这一运动的独立性。^①

仔细研究这一份“提纲初稿”，人们可以看出列宁的思想要点：加强对东方落后国家的工作，共产国际在落后国家“无产阶级政党的分子集合起来”，并且“通过教育认识到同本国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作斗争这些特别任务的条件下”，援助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民族运动；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但是不要同他们融合。目标则是打倒地主和资产阶级，战胜世界帝国主义，实现苏维埃制度的基本原则。

为了实现这一政策，共产国际在中国进行了十分积极的活动。首先是中国共产党的建立。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李玉贞在《孙中山与共产国际》一书中有一段分析是实事求是的。

李玉贞认为：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后来在共产国际中的地位，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自己“争取”到的，但从共产国际和俄共（布）方面看，则是他们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和“挑选”后决定予以支持的。早在1920年6月旅俄华工联合会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俄共（布）就想把这个组织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雏形，力图把它扩大，然后把它移植至中国。共产国际与俄共（布）派到中国的人员也是以这个想

^①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2、274～275页。



法为主线展开工作的。他们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活动发现原来的设想与实际情况不符。他们发现，当时中国政治生活中最活跃、最有影响的人物是陈独秀。共产国际放弃了原来的设计，选择了陈独秀等一批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于1921年7月成立了中国共产党。^① 马林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派遣，尼科尔斯基受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派遣，参加了成立大会。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按照《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的说法，形成了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结盟的条件。

二、共产国际加强对孙中山的工作

俄共（布）、共产国际人员不断地拜访孙中山，其中有两次重要会谈，一次是与马林的会谈，另一次是与达林的会谈。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马林就积极准备去广西桂林拜访孙中山。他和共产党员张太雷一同于1921年12月10日从上海出发。12月23日到达桂林，张太雷充当他的中文译员。马林在桂林住了九天，与孙中山举行了三次长谈。

李玉贞在《孙中山与共产国际》一书中，根据马林的著作《和孙中山在一起的日子》、邓家彦的《马丁（林）谒总理纪实》以及荷兰皇家科学院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收藏的“斯内夫利特（马林）档案”等资料，对孙中山与马林的谈话内容作了如下归纳，主要是：

第一，孙中山最关心的是俄国军队的组织和军队在十月

^① 见李玉贞：《孙中山与共产国际》，第84～88页。

